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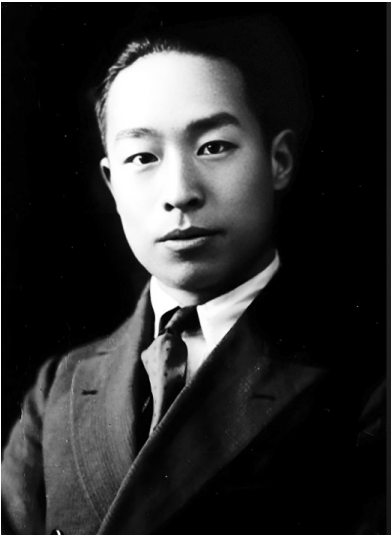
《围城》为何删去对冒广生父子的嘲讽

□苏魏

《围城》是钱锺书的名著。这部小说,以语言幽默刻薄名世。整部著作,刻薄得仅有唐晓芙、董氏父子“涉险过关”——未遭钱先生口诛笔伐。董氏父子即董沂孙、董斜川,两人原型正是明末如皋名人冒辟疆的族裔冒广生、冒效鲁父子。事实上,钱锺书最初在《围城》中讥讽过冒广生。何故讥讽,何故删订?不妨从钱锺书与冒氏父子交谈谈起。



冒广生、冒效鲁父子



相识考述

学林人士多有共识:1938年,钱锺书、冒效鲁结识于归国轮船。日后,钱锺书经冒效鲁介绍,结识冒广生。卞孝萱先生写过:“钱锺书因冒效鲁而识冒广生。”李洪岩《钱锺书与冒效鲁》也说:“回国后,冒效鲁介绍钱锺书结识疚斋先生(冒广生)老夫子,相谈甚欢。”此说“始作俑者”正是钱先生本人。钱锺书晚年为《谈艺录》补订时,追忆:游学欧洲,都抛旧业。归舶邂逅冒君景璠(冒效鲁),因以晋见其尊人。钱锺书晚年为《谈艺录》补订时,追忆:游学欧洲,都抛旧业。归舶邂逅冒君景璠(冒效鲁),因以晋见其尊人。钱锺书晚年为《谈艺录》补订时,追忆:游学欧洲,都抛旧业。归舶邂逅冒君景璠(冒效鲁),因以晋见其尊人。

钱锺书暮年记忆“有误”,他在此前已经读过那本《后山诗社社注补笺》。此书其实就是“冒氏丛书”中的《后山诗注补笺》。念及陈后山(徐州人)为苏北同乡,冒广生为《后山诗注》补笺。1936年,《后山诗注补笺》已由商务印书馆发行。钱锺书、冒效鲁归国途中,钱先生吟有《孝鲁以出处垂问,率陈鄙见,荆公所谓无知猿鹤也》(刊于1939年第5期《国师季刊》),日后更名《答叔子》,录入《槐聚诗集》。或刊或集,诗后皆注:方读疚翁《后山

诗笺》。言之凿凿,不容诋毁。

钱锺书结识、关注冒广生,始于陈衍,倒非冒效鲁。《冒鹤亭先生年谱》记载,1935年5月,冒广生赴苏州,为祝陈石遗(陈衍)八十生日,兼商谈赴粤日程,面晤钱锺书。钱锺书于《石语》中有所呼应:寿宴散席,陈衍恍然有曰:“子将西渡,余欲南归……”年轻的钱先生将西赴英伦,年高的陈先生将南下广东,两人再见,后会无期。早在1932年,冒广生诗作已给钱锺书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也在《石语》中有所记述,二十一年阴历除夕(1932年2月5日),陈衍笑掖后生,视钱锺书为知己,邀其守岁,促膝长谈,高谈阔论,点评诗坛。当日交心,陈衍直言不讳地点评冒广生诗作。

陈衍谈诗论友,冒效鲁情谊深厚,钱锺书才会创作和删订“董沂孙”的人物形象。

修订始末

1946年,《围城》初现于《文艺复兴》,关于董沂孙的描写,前后四句话:“董斜川的父亲董沂孙是个老名士,虽在民国做官,而不忘前清。生平不讲

好名,因为他实在好利。他最心爱斜川,认为他能传家学。他不叫斜川好好的念书,只等他在北京陆军大学混毕业,揩老面子,为儿子送条子,谋差使。”四句话,皆可索隐,皆有所指。

先前,陈衍已在《石遗室诗话》中点评冒广生:冒鹤亭早慧有声,长而好名特甚。余见其所刊《五周先生集后跋》及《外家纪闻》,文笔步趋古人……见君诗,佳句甚多,率笔者亦有时。

《石遗室诗话》《石语》皆言冒广生好名,《围城》中董沂孙为“老名士”。冒广生为清末举人,像其先人冒襄,可谓遗民、遗老,因此眷念前朝。至于“生平不讲好名,因为他实在好利”,应为反话,即钱先生欲盖弥彰的手法。1938年,钱先生阅览《后山诗注补笺》就有心得:每用“敢”字,作“不敢”解。于是他在《答叔子》(笔者注:叔子即冒效鲁)中所谓“此意轻轻敢苟同”,实为“不敢苟同”。旧诗可反用,何况小说乎?钱锺书是借《围城》讽刺冒广生不讲好名,实际好名。何处扯出“利”呢?源于陈衍逝后,冒广生给予评鹭:我 Goodman 君好利。冒陈恩怨,由来已久,后文再释。

后两句董沂孙的描写,前句写实,后句已含射影捏造。“他(董沂孙)最心爱斜川,认为他能传家学。”冒广生在《作诗一首示景璠》中写道:“我有五男儿,璠也得吾笔。书求南北通,字解形声别。”足见冒效鲁克绍箕裘,传承家学,深得父亲喜爱。“他(董沂孙)不叫斜川好好的念书,只等他在北京陆军大学混毕业,揩老面子,为儿子送条子,谋差使。”此句多为戏言反话。如同钱基博严格管教钱锺书,冒广生盼望冒效鲁好好学诗,作有《作诗一首示景璠》:“近来颇作诗,我当示棒喝。”

“混毕业、揩面子、送条子、谋差使”明显丑化冒氏父子的形象。冒效鲁学富五车、书通二酉,否则不为钱先生尊为诗友。《知非杂记》记载,1930年,冒效鲁全校考试名列第一,从北京俄文专修馆(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政法学院)毕业。傅增湘(并非冒广生)为他写信(送条子)给东北元老袁

金铠。还有冒广生的好友胡汉民,两次为冒效鲁写过条子,助其成为驻苏大使随员。无论在东北,还是于苏联,冒效鲁都很胜任工作。

自《文艺复兴》刊出后,1947年《围城》初版时,钱先生便删去有关董沂孙的后三句,仅留首句。此举两得:规避读者对于冒广生、陈衍之间恩怨的褒贬;钱锺书可不负两位知己:回避老知己陈衍好利的形象,维系新知已冒效鲁的友谊。

冒陈交恶

论及《围城》初始丑化冒氏父子,不得不回溯冒广生、陈衍交恶史。其间,钱锺书推波助澜。《石语》留痕,那夜谈诗,陈衍在向晚辈钱锺书推心置腹:交好中远如严几道、林琴南,近如冒鹤亭,皆不免空疏之讥……鹤亭天资敏慧,而早年便专心力作名士,未能向学用功。前日为《胡展堂诗集》求序,作书与余,力称胡诗之佳,有云:“公读其诗,当喜心翻倒也。”夫“喜心翻倒”出杜诗“喜心翻倒极,呜咽泪沾巾”,乃喜极悲来之意,鹤亭误认为“喜极拜倒”,岂老夫膝如此易屈耶?

陈衍全盘否定冒广生:聪明反被聪明误,天资用于求名,未用于学业,以至于学识固陋,误用“喜心翻倒”。钱先生为此写下按语:《小仓山房尺牍·答相国·与书巢》二札皆有此语,是随园已误用矣。

此按迫根源溯,讹误起源指向清人袁枚,似为冒广生开脱,实为陈衍佐证。有趣的是,冒效鲁竟然获悉按语。《石语》中还有钱先生两则关键按语——孝鲁见此,语予云:原函作“喜心倒极”;鹤亭挽石遗诗,遂有“我 Goodman 君好利”之语,盖反唇也。

《石语》为钱锺书所藏,他人难得一见。冒效鲁“见此”,应为钱锺书出示。陈衍批语,经钱锺书、冒效鲁,传入冒广生耳中。陈衍爱财,又是事实。因此陈衍离世,那句“我 Goodman 君好利”乃冒广生“自毁式”反唇,给钱锺书也留下印象,大概也成为他于《围城》中描写董沂孙的“引子”。

范公堤上的交汇点——倒埭子

□陈新华

倒埭子,曾是范公堤上通州与如东交界处的繁华枢纽。它位于原五总乡(通州区十总镇五总社区)北陲,确切说它在包公堤与海防新堰的交汇点上,宛如岁月织就的经纬线,将海盐文明的经纬深深织入江海大地的肌理。

明洪武二十五年(1392),海边煎盐地在北宋狄公堤东,分南、中、北三团,共三十总,倒埭子是北十总。在民国二十五年(1936)的地图上,倒埭子的位置被标注为“十总埭”,可以说明,倒埭子这个地名在近100年前的地图上也未出现,是一个近现代的地名。

关于倒埭子地名的来历,众说纷纭。一说是因倒买倒卖得名,但因倒埭子所处的地理位置,到明代,特别是清代后,由于海岸线的变迁,它逐渐失去了作为埭子、码头的作

明嘉靖三十年(1551),倒埭子所在地已经上岸。海岸线来到了十八总岸头至骑岸、五总、倒埭子以东一线,距老的狄公堤达10里之遥,狄公堤已失去了捍海的作用。于是,官府决定在狄公堤东北沿海地带构筑新的堤坝。从余西场(经东社)、金沙(十八总)、西亭(八总洋桥)到石港场(经骑岸、五总、倒埭),一道新的堤坝拔地而起,这就是海防新堰。海防新堰的筑起,标志着通州各盐场盐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明隆庆三年(1569),通州分司判官包怪芳自北边马塘场的彭家缺口筑堤,接倒埭子的海防新堰,将马塘场围在堤内,称“包公堤”。堤底宽3丈,提高1.5丈,堤顶宽1丈。

海防新堰和包公堤的筑成,让倒埭子成为两条海堤的交接点,后人统称为“范公堤”。倒埭子的历史也从明嘉靖年间开始书写,有了堤坝的守护,堤岸西边的土地不再惧怕海潮的侵袭,盐业继续繁荣。

倒埭子的经济活动丰富多彩。起初,该地因外来移民入驻捕鱼煮盐,后陆续散居滩涂海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商人和农民前来交易。南来北往的商贩、车夫、乡民、渔民在这个路口进进出出,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集市。从民国二十五年的地图上看,倒埭子比南边骑岸镇的集镇规模略小一点,超过了五总埭及十总店。这里曾是江淮盐运的神经末梢。

家住倒埭子路口的潘世杰老先生,今年89岁高龄,原为南通县政协委员。潘老先生回忆说,旧时,倒埭子房屋两百多间,有店铺20多家,青石板铺的街道500米左右,北眺如东小埭,南望五总市廛。曾经的两家药店、两家杂货店、一家酱油店和一家花行令他记忆深刻。两家药店一家是曹埠苏家开的,一家是本埠人合开的,酱油店是如东孙窑人开的,还有镇江等外地人开来的杂货店、茶食店等等。“人宜济世,和养回春”——这是江家药店门口的对联,让他难以忘怀。老一辈人口口相传“先有倒埭,后有五总埭”,倒埭子有早市、晚市,特别是农历大汛期到来时,挑着海货担子过来做交易的,每人一个摊位,在街面上一字排开,有50至60米长,银带鱼铺满半条街,刚起的昌娥还带着咸沫子,胜似庙会,热闹非凡。本地人称它为“八仙行”,是倒埭子的一大商业景观。

对于倒埭子的由来,潘老先生回忆说,小时候曾在收花的花行“店戳子”上看到过“岛埭子”的字样。他觉得最初的倒埭子是海里的一个岛,四周环水,所以称“岛埭子”。明清时期,倒埭子连接着海堤与总田,是卖渔湾渔民下海、盐民运盐和商人卖货的重要通道,最初作为一个岛、潮墩存在也是有可能的。对于倒埭子地名的由来已无考,无论是“倒买倒卖”的交易说,或是“埭子倒塌废弃”的崩塌说,还是潘老先生的岛屿说,都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,共同构成了倒埭子的历史文化内蕴。

倒埭子不但在范公堤上,也位于古横江遗址的东部,处在南通口音跟如东口音的剧烈碰撞地带,它跟五总渡海亭村、石港北、五窑、刘桥北部一样,形成了独特的“古横江”牌口音。比如,“吃肉”的“肉”字,这边读“ruo”;“家去”(回去)的“去”,这边读“qi”。又比如,吃饭的“吃”这里发音为“肿”。这是南北互通后形成的独特口音。

而今,那些在晨雾中称盐的铜斛、那些在黄昏里唱晚的渔榔,都化作老者烟里闪烁的星火。现在的倒埭子路口有饭店、超市、杂货店、电瓶车店、电器店、肉铺、理发店等商业店铺。当现代化的浪潮漫过旧时的堤岸,倒埭子的青石板早已沉入草莽。唯有范公堤的残垣,在月光下默默守护着这段被潮汐反复书写的传奇,等待着某个晨昏,让“八仙行”遗失的乡音再次在堤岸上空苏醒。

下图:民国二十五年地图上倒埭子位置上标注的“十总埭”



旧时南通城的店招

□任寿

有店必有招牌,招牌给客户的印象十分重要。旧时,南通城较为常见的招牌有文字招牌、形象招牌、实物招牌、象征性招牌等。

文字招牌,如裁衣铺,写“成衣”二字悬挂在横杆上伸出店外;当铺在门外墙上写一个“当”字;酱园店写上“酱园”二字。考究的文字招牌采用漆器贴金,如去过南大街的“乾元泰”“王万隆”“裕成”“广源”,东大街的“茂康庄”“胡永泰”“大福来”“百和春”,西大街的“信成”“怡大庄”“协康庄”“大禾”“新源”“汇丰”“永泰昌”“鼎成”等店号都是“金字招牌”。形象招牌,如刀剪铺画上剪刀、菜刀,膏药店画上一张膏药,眼镜店画上一副眼镜。实物招牌,修车铺挂一只铁钢圈、补胎店挂一只旧轮胎、颜料店挂若干根刷有各种颜色的竹片或木片。象征性招牌,理发店用蓝红白三色斜条纹的玻璃转筒,浴室门口挂一只灯笼(浴室门口都以悬挂灯笼作为“开汤”的标志,俗语说:“澡堂子的灯笼天天挂”)。形象、实物等招牌可以使不识字的顾客一见到就能找到目标,起到广泛招揽顾客的作用。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商店的经营方式和门面装饰发生了很大变化,许多商家的招牌多使用霓虹灯或有机玻璃的灯箱等。有些商家还喜欢在新产品刚进场时,在店门口竖上一两块“战牌”,写上新到的热门货或处理商品等信息以招徕顾客。

掘港京剧艺术家王鸿寿

□程太和

王鸿寿(1850—1925),艺名“三麻子”,如东掘港西郊茶庵殿人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。

王鸿寿父亲为通州水道运粮官员,家有昆、徽两副戏班,自幼聪颖过人,受其熏陶,王鸿寿与京剧渊源颇深。清咸丰十年(1860),父亲因被诬陷而遭灭门之罪,仅王鸿寿一人逃出。他逃难到南京,加入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办的戏班学艺。1864年,太平军失败,他来到苏北里下河地区开始演出生涯,当时才14岁。这个过程中,里下河徽班也纷纷外出巡演。上海地方史料有记载,当时在上海八仙桥一带的荒地上,出现了三个草台剧场,都以竹篱、布幔搭起简易的剧场,演出者都是流浪江湖的徽班。后来,王鸿寿等也来到上海。他们的出色表演使得徽班的观赏性越来越强。相比之

下,昆曲和山西班、广东潮州班、浙江绍兴班就显得古奥艰深、晦涩难懂,于是它们逐渐没落。上海人爱看徽班的信息很快传开,使北京的徽班闻风而动。此时徽班进京已经七八十年,在京城文化的浸染之下,他们的艺术获得进步,今非昔比,报纸上说“沪人初见,好评如潮”。有演出商为他们打造专演剧场,票价加得很高。这就造成了两类人分别看两种徽班:有钱的上层人士看北京来的徽班,中下层观众看里下河来的徽班。同治十一年(1872),在《申报》刊登的戏园演出广告启事上,首次以“京戏”二字指称北京来的徽班。从此,风格有所不同的两种徽班被逐渐分开。

王鸿寿逐渐成为里下河徽班的标志性人物,他常用的唱腔里有老徽班里的“高拔子”和“吹腔”,这是“京班”里没有

的。王鸿寿还创造了介于老生和武生之间的“红生”行当,这个行当主要是演关公戏。关公出场前由马童先出来翻一串跟斗以为引领,出场时身后竖一面方形“关”字大旗,这样的处理也是从王鸿寿开始的。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关公戏,都是王鸿寿所创的南派演法,王鸿寿是南派京剧的奠基人之一。光绪元年(1875),王鸿寿在上海小东门外升平轩戏园,以武生戏《武当山》、老生戏《九更天》享誉沪上,《申报》曾有专门报道。王鸿寿京剧艺术造诣极深,除演文武老生外,有时串花脸,亦串演小丑,融武生、靠把老生、架子花脸、做工老生于一炉,唱念做打俱精,无戏不工,尤其擅长演《古城会》《走麦城》《潮桥挑袍》《水淹七军》《过五关》等红生戏。王鸿寿在继承前辈演艺的基础上,大胆对关羽脸谱、唱腔、造型、身

段、服装和念白等诸方面进行改革,推陈出新,把关羽形象活现在舞台上,被京剧界誉为“活关公”,尊为红生鼻祖。京剧大师周信芳和京剧名家杨洪春(与王鸿寿同为如东掘港人)、林树森、刘奎官等先后都是王鸿寿的嫡传弟子。绘画大师刘海粟早年 在上海,曾多次观看过王鸿寿演出,盛赞他的关公戏:“王鸿寿演老生以古朴见劲道,演红生为一代巨匠,叱咤风云,实已至化境。”以画喻戏,还说“三麻子的戏,实具大泼彩风情,每观演出,给人的艺术享受,在瞠目结舌之余,回味几十年”。

民国十三年(1924)秋,王鸿寿74岁时,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抱病登台演出《走麦城》。一招一式仍威严工整,神韵十足。在散场后,人们才发现王鸿寿胯下骑马辮断裂,鲜血浸透衣裤。从此,王鸿寿便卧床不起,于翌年1月24日与世长辞。

以一营之力阻击两团之敌

□李元冲

麒麟镇战斗,是海门全境解放前夕的最后一次大战,参战的敌军除守军外,还有敌正规部队四三八团、四三六团,海门实业警察大队、县保安团等共数千

人。这是敌人最后的疯狂,因此战斗打得十分激烈,作为麒麟镇战斗的一部分——铁板洋桥阻击战,打得尤为激烈,它创造了“一个营阻击两个团”的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。

听说参加铁板洋桥阻击的一位老战士顾成祖至今还健在,为此笔者与社区几位老同志特地去采访了他。顾成祖今年94岁,是当年威震海启的东南警卫团的老战士,是那场阻击战的亲历者。顾老出生于原三阳镇烈士村(今悦来镇阳东村),14岁就参加儿童团,15岁参加民兵,17岁正式参军,被编入东南警卫团一营一连,为机枪手。他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斗上百次,但最使他难忘的是发生在1948年的铁板洋桥阻击战。他说这次战斗我们以少胜多,阻击了近两个团的敌人,保证了麒麟镇战役的胜利,打得解气、解恨。

1948年3月华东军区第九分区部队继解放通东重镇余东镇后,准备挥师南下。此时通东及海启地区的敌人害怕

被我军各个击破,因而纷纷向四甲等大据点集合兵力。为消灭这些大据点的敌人,1948年8月,我军决定首先拿下海启公路上的重要通道麒麟镇,以切断敌人的东西往来。

麒麟镇据点工事坚固,四周还有高墙和护河,且离三厂、常乐等敌据点较近,敌人容易增援。我军经过多次侦察,综合分析敌情,决定以分区八团为主攻部队,攻打麒麟镇,分区九团、东南警卫团、如东警卫团等设伏在海界河沿线及二匡镇等处,阻击从三厂、四甲和南通方向来增援的敌人。东南警卫团的任务是设伏于麒麟镇西北的海界河沿岸,防止四甲和南通方向的敌人前来增援。海界河沿岸设伏的重点是铁板洋桥(今属四甲镇惠才村境内),东南警卫团在那里放了战斗力最强的一营,作为守桥部队,阻击敌人过桥增援麒麟镇敌人。

顾老说,9月16日晚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后当即赶到铁板洋桥,先把铁桥板拆了,在铁板洋桥南侧不远处挖了工事,战士们有的埋伏在工事里,有的埋伏在附近的玉米田和高粱田里。他所在机枪班的十几挺机枪也分散开来,分别设伏在工事里和田野隐蔽处。顾成祖和其他

二位同志扛着一挺机枪设伏在一处群众的草房上。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铁板洋桥方向,专等敌人前来。

第二天拂晓,从四甲据点来增援麒麟镇的敌人赶到了铁板洋桥。我方原以为来增援的部队不会超过一个营,但实际上来增援的部队是敌人的四三八团,人数在1000多人,和我方300多人相比,足足超过了3倍多。而且四三八团是敌人的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。面对强大的敌人,我方警卫团的战士严阵以待。这时敌人的先头部队首先来到了铁板洋桥,一看铁桥板已被拆除,怕桥南有埋伏,于是向桥南连发了几十发炮弹以探虚实,埋伏在桥南的我军一动不动。敌人认为没事了,不多一会敌人扛来了不少木板,开始铺设桥面,我军仍一动不动。不多一会敌人把桥板铺好了,首批人员踏上了桥面,我方营长仍未下达战斗命令。当敌人排着队刚过桥走到南桥堍时,一声号令,我军机枪、步枪一起开火,走在桥上的几十个敌人全被打下桥落水而死。敌人发现了我军的阵地下,立即以强大和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开火,我军伤亡较大。敌人再一次组织冲桥行动,我军迅速组织机枪掩护,几个战士拿

着炸药包去炸桥板,桥板炸毁了,但战士也牺牲了。敌人企图再一次铺设桥板,但又一次被我军击退了……这样经过几回较量,敌人的铺桥阴谋始终未能得逞。

拉锯过程中,敌人突然发起了更加强大的火力进攻,原来从南通方向来增援的四三八团二个营也赶到了。由于海界河东段已被我分区九团封死,敌人无法过河,于是向西转到了铁板洋桥与四三八团合力,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强行过桥。

敌人把桥板再次铺上时,已是下午四时,我军接到了撤出战斗的命令。而敌人还未踏上桥板就马上退了回去,原来麒麟镇已经被我八团拿下,慌不择路的敌人赶紧向北逃窜,顾成祖和战友们手中的机枪再一次发挥了威力,走在后面的敌人被打死了几个,敌人边打边退……顾成祖说,当时营长对大家说,让他们多活几天吧,反正他们都已经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了!

顾老最后说,这次阻击战,我军在击毙了敌人400多人的同时,我方也有100多人的伤亡,虽然完成了阻击任务,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。

铁板洋桥阻击战后,顾成祖所在的一营受到了苏中四分区首长的表彰。